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北京建置沿革史

本书主编 尹钧科



人民出版社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K921
Y597

北京建置沿革史

本书主编 尹钧科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建置沿革史 / 尹钧科 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

(《北京专史集成》/ 王岗 主编)

ISBN 978-7-01-007414-6

I. 北… II. 尹… III. 政区沿革—北京市

IV. 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144 号

北京建置沿革史

BEIJING JIANZHI YANGESHI

主 编: 尹钧科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关 宏

封扉设计: 曹 春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414-6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顾问：刘牧雨

总策划：戚本超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钟翰、陈高华、林甘泉、赵其昌、徐莘芳、曹子西、龚书铎、蔡美彪、戴 逸

名誉顾问：陈之昌

执行策划：王 岗、李宝臣、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郑永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何 力、郑永华、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

课题组特邀成员：张 泉、齐大芝、赵志强、徐丹佺、李建平、韩 朴、谭烈飞、马建农、姚 安、邓瑞全、郝志群、宋卫忠等

本书主编：尹钧科

本书撰稿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序）：尹钧科 董 焱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1. 北京政治史；
2. 北京经济史；
3. 北京农业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7. 北京文化史；
8. 北京文学史；
9. 北京美术史；
10. 北京学术史；
11. 北京著述史；
12. 北京戏剧史；
13. 北京风俗史；
14. 北京考古史；
15. 北京民族史；
16. 北京宗教史；
17. 北京佛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1. 北京教育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3. 北京建筑史
24. 北京园林史；
25. 北京陵寝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7. 北京交通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1. 北京水利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成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年10月

前 言

《北京建置沿革史》是北京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置沿革是由两个词合成的，一为“建置”，一为“沿革”，最早将这两词合用的是宋朝人，及至明清时期，已经在各种《一统志》和《地方志》中普遍使用，成为一个有着特定内容的专有名词。所谓“建置”，就是在某个地域范围内设置的各种重要行政机构；所谓“沿革”，则是这些行政机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北京建置沿革史》，就是研究在北京地区的历史上曾经设置过哪些重要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显著的变化。因此，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建置沿革”，其含意已经比古人要丰富多了。

首先，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而言，政治机构的设置，能看出这一时期人们管理社会的能力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国”曾经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行政概念，诸侯国的出现、发展及变化，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从秦汉时期开始，郡县制度逐渐替代分封制而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主体，并且不断有所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到了汉代，除一般行政意义上的郡县之外，又出现了专门负责监察的刺史州。而当“州”变成一般行政单位之后，又出现了“道”和“台”等监察机构。这种建置的沿革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最初作为中央专职机构的“省”，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又成为一级地方机构，分为“直隶省”和“行省”。

除了一般行政单位之外，军事机构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在一些战略要地设置城池，驻扎军队，形成聚落之后，这些军卫逐渐变成了行政单位，于是，军事机构和监察机构一

样，失去了原有的特殊政治功能。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后，封建统治者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军卫，有些军卫变成了郊区的一些村镇，如高丽营、阿速卫等村庄的名称就保留了相关的历史信息。除了行政、军事、监察机构之外，交通运输机构也是“建置沿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最初的“亭”发展为“驿”或“铺”，这些机构也遍布于全国各地。随着朝代的变更，以及统治者们的需求变化，交通运输机构也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之后，这里也变成了全国的交通枢纽，交通运输机构尤为发达，其变化是很大的。《北京建置沿革史》要想把这些丰富的内容都涵盖在里面，显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目前只是把行政体制的大致变迁脉络加以梳理，进行简要的概括。

其次，从行政功能的角度来说，每一项政治机构的设置，必然会有其特殊的行政功能。“分封制”的产生及推行，造就了一大批依附于中央天子的诸侯国，并且一度为巩固中央的统治产生了有益的效果。而郡县制的出现及其取代“分封制”成为行政建置的主体，就是因为其弥补了“分封制”遗留下来的重要弊病。此外，在中国古代的行政建置体系中，军政合一的形态是一种最原始的政治形态。随着军事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行政与军事的管理体制也逐渐分离，出现了专门负责军事的机构。在许多农耕民众与游牧部落接壤的地方，中央政权往往会设置一些用于攻防的军事要塞，北京周围的一些州县的设置，就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有些州县的军事作用逐渐消失了，遂并入了行政体系之内。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地区之后，带来了他们原有的军政合一制度，如金代在营建中都城之后，将许多东北地区的猛安、谋克迁到这里来，清代初年，满族统治者在攻占北京之后，更是将八旗子弟分置北京内城。这种猛安谋克制度和八旗制度出现在北京，并得以长期存在，是北京建置沿革史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建置沿革史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比较难以处理的，即中央职能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问题。在北京没有成为都城之前，这里的所有政治、军事、监察、交通，乃至文化教育机构，都是地方行政机构，内容比较单一。而当北京成为都城之后，所有的中央机构就都设置在这里，再加上原有的地方机构，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讲地方机构显然是不行的，但如果又涉及中央机构，其地位与作用又远远超过了地方机构，已经不

仅仅是区域历史所能够涵盖的了。另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范围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先秦时期的燕国，其行政地域不仅仅局限在北京，而且包括了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扩展到了辽东地区。此后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道、金代的中都路、元代的大都路，乃至明清时期的顺天府，其行政地域范围都要比现在的北京市大得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每个行政区域内部的机构（如州县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单元，我们不可能因为其现在不是北京行政区的范围而将其生硬地切割出去，我们只能强调某个朝代的某些地区是在今天北京市行政区的范围之内，或者某些地区已经不在今北京市的范围之内了。

再次，有几个重要的专题是建置沿革史需要涉及的。第一个专题是分封制与郡县制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作用和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而郡县制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血缘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关系，而地缘关系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补充。我们认为，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郡县制比起分封制来，只不过在行政效率方面占有较大优势而已。在家庭财产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中，政治关系当然也是要以血缘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血缘关系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显然，在人际关系方面，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而以地缘关系为辅；在行政建置方面，则从分封制为主转变为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在中国古代，正是这种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政治体制，从血缘和地缘两个方面加强了封建统治，才保证了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的存在。只有当整个社会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这个“超稳定”的统治结构才会失去效能。

第二个专题是北京地区建置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的原因。在古代的北京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城市和村镇，以此为依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机构。有些城市发展了，政治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蓟城，最后发展为超大规模的国际化大都会北京。也有些城市逐渐消亡了，在政治体系中被除去了，例如燕国始封地的琉璃河遗址，人们今天已经无法将其与北京城相比，但是在西周初年它肯定比蓟城更强大、更重要。这些行政建置机构赖以依托的城镇，为什么有些迅速发展，有些逐渐消亡，我们的建置沿革史研究是应该给出答案的。

第三个专题是北京建置机构与古城址及古衙署的相互关系。

在古代的北京地区，行政机构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其依托的城池和衙署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以衙署的变化为例，就包含着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治机构分布的文化理解程度的差异。金中都城作为北方割据政权的统治中心，它的营建却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风格，基本遵循的是宋朝都城汴京的模式，这种文化上的模仿，显然出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崇拜。到了元代营建大都城，同样是遵循儒家学说，却有着完全不同于前代的独特文化风格。它在各级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上，贯彻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地上的衙署与天上的星象对应起来。而到了明代营建北京城，也没有继承元代的文化观念，而是采用了另一整套文化观念，即左文右武的阴阳五行系统，所有的文职衙署都放在皇城的东面，而武职衙署则放在皇城的西面。至于北京历史上遗存的许多古城址，当年曾经设置过什么样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是如何设置的，如何衰亡的，仍有一些未解的谜团，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显然，北京建置沿革史需要研究的问题还不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深入。本书主要撰稿者尹钧科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在历史研究所工作的20多年中，遍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又亲身踏勘北京的山山水水、古城村落，在将历史文献与实际情况两者结合从事研究的工作中，创作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荣获“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他在这部《北京建置沿革史》中，利用深厚的学术积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创见，有着可贵的真知灼见。董焱同志是我所新来的年轻博士，在尹先生的指导下参加了《北京建置沿革史》的撰著工作，在取得一些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学术收获。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是我们历史研究所的优长学科，预祝在今后的“北京专史集成”系列科研成果中，能够产生更多历史地理方面的好成果。

王岗

记于2008年7月

概 述

何谓“建置沿革”？建置，意为“设置”。设置什么呢？设置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如州、郡、诸侯王国、道、路、省、府、厅、县、乡、镇等等。沿革，意为沿袭和变革，即后代对前代的各种行政建置，有的相沿不变，有的则被撤销、合并、更名、迁治，这种不变和有变的过程，就是沿革。所谓“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指的就是历朝历代在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相沿和变化的整个历程。这个历程在时间尺度上已有三四千年。其间，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概要说来，有如下述：“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¹⁾传说黄帝时始“划野分州，经土设井，立步制亩。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为井而计州，则土著而数详。此建置之始也”。⁽²⁾

在夏、商、周三代，北京地区属幽州。西周初年（前1045年，一说是前1046年），⁽³⁾周武王灭商之后，即封黄帝的后人（一说帝尧的后人）于蓟。⁽⁴⁾稍后，又封召公奭于燕。⁽⁵⁾也就是说，西周初年，北京地区有蓟和燕两个诸侯国。蓟国都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燕国都燕，在今房山区董家林附近。大约在西周中后期，强燕灭弱蓟，而迁都于蓟。⁽⁶⁾

春秋、战国时为燕国。春秋后期，始在边远地区设郡、县。初，县大而郡小，州制县领四郡。战国时，燕国与秦、楚、齐、魏、赵、韩并称“七雄”。战国后期，燕昭王招贤纳士，励精图治，燕国强盛起来。燕将秦开率军击东胡，东胡北退千余里，燕国西从造阳、东至襄平筑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拒胡。⁽⁷⁾这是北京地区正式设郡之始，为后代的地方行政建置

奠定基础。

秦（前 221—前 207 年）废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始皇二十一年（前 226 年），秦军攻破燕都蓟城，燕王喜逃亡辽东。二十三年（前 224 年），秦于蓟城置广阳郡。⁽⁸⁾二十五年（前 222 年），秦军破辽东，虏燕王喜，燕亡。秦沿袭燕之旧郡，故秦朝燕国故地有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六郡。其中前三郡与今北京市境相涉。郡下领县，秦县有蓟县、良乡、军都、居庸、渔阳等。

西汉（前 206—8 年）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初，汉高祖于蓟城置燕国。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改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前 73 年）又改为广阳国。汉广阳国领蓟、广阳、阴乡、方城四县。⁽⁹⁾同时，今北京地区在西汉时还有上谷郡，领十五县，其中军都、居庸、夷舆三县在今北京市境。又有渔阳郡，领十二县，其中渔阳、狐奴、安乐、平谷、路县、犀奚、犷平等县在今北京市境。又有涿郡，领二十九县及侯国，其中良乡、西乡二县在今北京市境。另外，勃海郡属之安次县亦与今北京市相涉。至于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及领县与今北京市无关，略。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 年），在全国置刺史部十三州，幽州刺史部为其一。⁽¹⁰⁾但西汉幽州刺史部为监察区，非行政区。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8—25 年）。莽新大量更改郡、国、县名。如改广阳国为广有郡，改渔阳郡为通潞郡，改蓟县为伐戎，阴乡为阴顺，渔阳县为得渔，路县为通潞亭，狐奴县为举符，犀奚县为敦德，犷平县为平犷，夷舆县为朔调亭等。⁽¹¹⁾

光武中兴，建立东汉（25—220 年），恢复汉制，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建武十三年（37 年）废广阳郡，并入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96 年）复置广阳郡。东汉广阳郡领蓟、广阳、昌平、军都、安次五县。⁽¹²⁾另有上谷郡，领八县，只居庸一县在今北京市境。有渔阳郡，领九县，渔阳、狐奴、安乐、潞、平谷、鹿奚、犷平在今北京市境。涿郡，领七县，只良乡一县在今北京市境。最重要的是，东汉幽州刺史有固定治所，治蓟，⁽¹³⁾成为一级政区，广阳、上谷、渔阳、涿郡等皆属之。建安十八年（213 年）曹操复九州之制，幽州废。

三国魏（220—265 年）时，文帝复置幽州。太和六年（232 年）于蓟城置燕国，领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五县。又有渔阳郡，领渔阳、潞、安乐、泉州、雍奴、狐奴（后废）六县。⁽¹⁴⁾以上除安次、泉州、雍奴三县外，余皆在今北京市境。此外，涿郡属

之良乡县，上谷郡治之居庸县，亦在今北京市境。

西晋（265—316年），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西晋幽州移治范阳（今涿州）。仍于蓟城置燕国，废渔阳郡，领县改属燕国，故晋燕国领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渔阳、潞、泉州、雍奴、安乐十县。⁽¹⁵⁾除安次、泉州、雍奴三县外，余皆在今北京市境。此外，上谷郡属之居庸县，范阳郡属之良乡县，亦在今北京市境。平谷县废。

十六国时期（317—420年），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先后拥有幽州地区，于蓟城或设燕郡，或置燕国，多有变化，领县不尽相同。其他郡、县亦然。后赵石勒于潞县北复置平谷县，⁽¹⁶⁾前燕慕容儁一度都蓟，后迁都邺，⁽¹⁷⁾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事。

北朝（420—589年）时期，包括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五个割据王朝，先后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分治中国东部之北、南。

北魏（386—534年）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与今北京市相关的是幽州、燕州、安州。幽州，治蓟城，领燕、范阳、渔阳三郡。燕郡领蓟、广阳、良乡、军都、安城五县，皆与今北京市有关。渔阳郡之潞县在今北京市境。燕州之上谷郡所领居庸县在今北京市境。安州之密云郡所领白檀县与今北京市相涉。

东魏（534—549年）天平中，东燕州及所领郡县从居庸关外内徙，寄治幽州军都县内。元象中，安州及所领郡县从古北口外内徙，寄治幽州北界。⁽¹⁸⁾从而使幽州界内的建置沿革复杂化。西魏远在秦陇，不论。

东魏禅位北齐。北齐（550—577年）实行道、州、郡、县四级制。于幽州蓟城置东北道行台。天保中大规模省并州、郡、县，幽州、东燕州、安州及所领郡县变化很大。后详。

西魏禅位北周。北周（557—581年）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始有幽州版图。北周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短短四年内，幽州地区的行政建置亦多变化。

隋（581—617年）承北周，后统一全国。文帝时废郡，实行州领县二级制。在今北京地区有幽州、玄州。开皇初徙玄州于无终，于故地改置檀州。炀帝又改州为郡，实行郡领县二级制。幽州改涿郡，领蓟、昌平、良乡、潞、涿、安次、固安、雍奴、怀戎九县，前四县在今北京市境。檀州改安乐郡，领燕乐、密云二县，皆在今北京市境。玄州改渔阳郡，渔阳县（今天津蓟县）西北境为今

平谷地。⁽¹⁹⁾

唐（618—907年）有国近三百年，实行道、州（郡）、县三级制。其间，今北京地区的建置沿革最为复杂。要害是幽州总管府、大总管府、都都府、大都督府的升降变换及相应辖域的改变；州改郡、郡改州的变化；州、郡、县的新置及并省；大批羁縻州县的内徙及安置等。至唐后期，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是：幽州大都督府（曾改范阳郡），属河北道，州领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清、安次、昌平、良乡九县。除武清、永清、安次三县外，余都在今北京市境。幽州城始出现蓟、幽都二县并治的情况。檀州（曾改密云郡），属河北道，州领密云、燕乐二县，皆在今北京市境。于今顺义地置归顺州（归化郡）及怀柔县，后演变为顺州。此外，蓟州（渔阳郡）之渔阳县西北部和三河县之北部，亦在今北京市境，为今平谷区大部和顺义区东部之一部分。今延庆县地，唐置妫川县，属妫州（治怀来老城），唐末置儒州。⁽²⁰⁾

五代梁（907—923年）时，幽州地区为藩镇势力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盘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此前，刘仁恭在大安山建宫观，营造安乐窝，遂置玉河县以供应之。⁽²¹⁾后唐天祐十年（913年），李存勖灭刘氏父子，幽州地归于后唐。

辽代（916—1123年），自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为酬谢援立之功，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后，幽燕之地入于契丹人之手。天会元年（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又号燕京，建为陪都。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从此，幽州由一个地方行政中心上升为辽王朝的陪都。辽实行道、府、州、县四级制。辽在升幽州为南京后，置南京道、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又废蓟县为蓟北县，后改析津县；改幽都县为宛平县。太平（1021—1031年）年间，置灤阴县；太祖初置行唐县。故辽后期，于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之：析津府，府领析津、宛平、昌平、良乡、潞、安次、永清、武清、香河、玉河、灤阴十一县，又领顺州及怀柔县、檀州及密云、行唐县。府属其他州县均与今北京市无关。⁽²²⁾此外，今平谷区为蓟州渔阳县地，延庆县为西京道奉圣州属之儒州及缙山县地，怀柔北部山区为中京道北安州之兴化县地。

宋宣和中，与金相约南北夹攻辽。宣和四年（1122年）金人攻取辽南京，以南京空城及山前六州予宋。宋置燕山府路及燕山府以统之。⁽²³⁾但时仅四年，金人复取幽燕之地。

金（1115—1234年）于宋宣和七年（1125年）复取幽燕之地